

80年代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出生人口性别比 与生育水平变化的历史回顾

张丽萍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1)

摘要: 本文以“四普”、“五普”数据为基础, 采用人口间接估计技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水平和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化的历史过程进行回顾, 探讨生育水平下降过程中, 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趋势, 并以蒙古族、回族和维吾尔族为例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表明当生育水平下降到较低水平时与出生人口性别比之间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关键词: 少数民族; 出生人口性别比; 生育水平

中图分类号: C92- 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4149 (2006) 05- 0066- 05

An Historical Review on the Sex Ratio at Birth and the Fertility Level Changes of Chinese Minorities Since 1980s

ZHANG Li_ping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4th and 5th national censu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fertility level and birth sex ratio of Chinese Minorities from 1980 to 2000 by indirect estimation, explores the trend of birth sex ratio during the fertility level declines. Taking Moguls, Hui and Unger as example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the result indicated the sex ratio at birth is highly correlated to fertility when the fertility level is getting into lower level.

Keywords: minorities; birth sex ratio; fertility level

一、研究背景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达20多年的持续升高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一问题的存在和日趋严重, 有着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和计划生育政策环境背景, 应该从多方面深入研究, 既要研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历史原因, 又要探讨其作用机制。

研究表明, 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是伴随着生育转变的过程而出现的,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问题往往会在这样的人口中出现: 社会经济正在发展之中, 生育率经历了急剧的下降, 但强烈的重男轻女的生育文化依然存在”^[1], 通过对生育水平快速下降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发现, 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东亚、南亚国家或地区都普遍存在, 出生性别比均随

收稿日期: 2005- 11- 21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号05BMZ029)《当代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散、杂居态势与发展趋势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张丽萍(1968-), 女, 黑龙江讷河人,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学。

生育率的下降出现了偏高或升高的迹象^[2]。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不仅表现为持续攀升的特点，而且在不同民族、地域间也存在显著差异。研究表明，2000 年少数民族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 111.93，恰好处在 1990 年汉族的水平上^[3]，同时少数民族的生育水平也与汉族一样处在下降过程中。那么少数民族会不会同样在未来几年生育水平下降过程中出现与汉族一样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需要注意的是，表面看少数民族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升高仅仅只是一个性别结构不合理的人口问题，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这一问题带来的严重后果也会成为影响民族繁荣、民族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必须引起重视。

应对出生性别比升高问题，不是靠单一手段或措施就能够取得显著效果的，还需要对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对策。本文重点探讨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汉族与少数民族生育水平下降与出生性别比升高之间的关系，以便为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二、数据与方法

研究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少数民族生育水平变化与出生人口性别比之间的关系，需要各年度生育水平和出生人口数据，但是目前没有直接的对全国具有代表性的、分民族的生育史回顾性调查资料，虽然可以使用人口普查数据进行研究，但普查数据属于时点数据，不能完整、连续的反映出生人口性别构成和生育水平的变化过程。因此，需要在现有时点数据的基础上，对人口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重构。本研究可以依据的分民族、分性别的普查数据只有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

具体间接估计可以利用人口间接估计软件，采用以下四个步骤完成：第一，构造分民族、分性别单岁组生命表。由于“五普”分民族的死亡数据是按 5 岁分组数据，首先根据 5 岁组的人口年龄结构数据和死亡数据分别计算不同民族人口的生命表，得出预期寿命，然后根据预期寿命和 5 岁组死亡率，通过仿真得出不同民族分年龄、性别人口的单岁组死亡率和生命表；第二，用“存活倒推法”推算各年份分民族、分性别的人口年龄结构，以“四普”推算 1980 年到 1989 年、以“五普”推算 1990 年到 1999 年的年龄别人口数据；第三，计算分民族出生人口性别比，以推算得出的 0 岁人口数代替出生人口数；最后，用遗传算法推算分年份、分民族的年龄别生育率和总和生育率，具体算法和原理见文献^[4]。

需要说明的是，反映生育水平的指标中总和生育率和递进生育率可以有效地衡量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递进生育率虽然剔除了时间进度效应的影响而能够更好地反映妇女的生育水平，但由于受现有数据和计算复杂的限制，本文仅以总和生育率来衡量生育水平的变化。

三、研究内容与发现

1. 总和生育率下降的同时，出生人口性别比呈上升趋势

回顾少数民族生育水平下降的历史可以看到（见图 1），1980 年到 2000 年 20 年间，少数民族总和生育率从 4.01 急剧下降到 1.81（不考虑数据漏报问题）。根据下降过程可以具体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波动下降阶段，从 1980 年到 1989 年 10 年间，总和生育率一直在 4.36 到 3 之间波动；第二阶段是接近低生育水平的下降阶段，从 1990 年到 1996 年 5 年间从 3 下降到 2；第三个阶段是处于低生育水平的下降阶段，这一过程是在 1996 到 2000 年之间完成的，总和生育率从 2 到 1.8 左右。

从总体上看，少数民族和汉族生育水平都处于下降之中，由于特殊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生育转变明显晚于汉族，历年的生育水平都高于汉族，但少数民族与汉族生育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在 1980 年到 1985 年期间，少数民族的总和生育率

高于汉族 1.4~ 1.6 左右, 在此之后两者的差距急剧缩小, 从 1986 年的相差 1.25 到 1991 年的相差 0.52, 从 1992 年起少数民族的生育水平仅高于汉族 0.6 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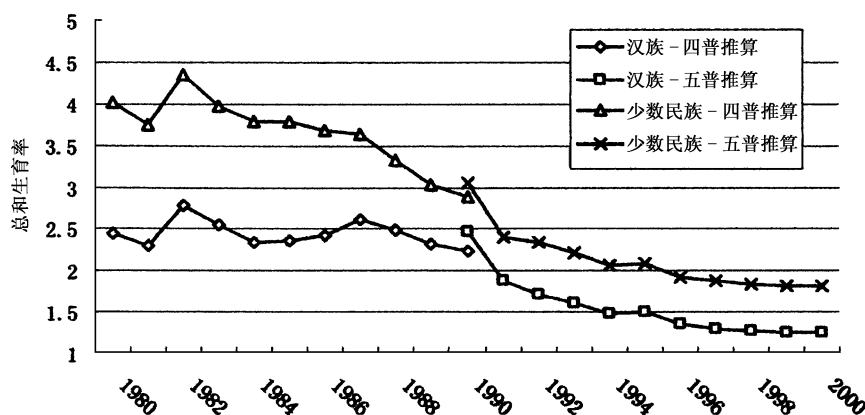


图1 1980~ 2000 年少数民族、汉族总和生育率变化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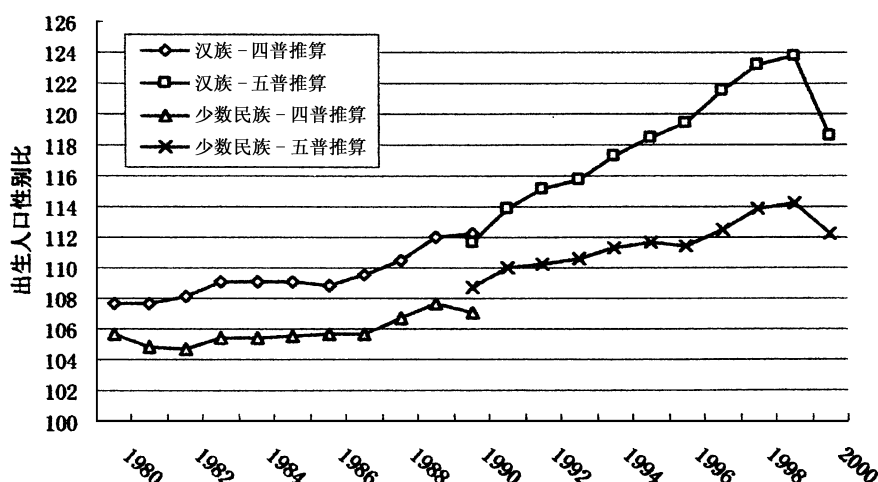


图2 1980~ 2000 年少数民族、汉族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化情况

从图2可见, 20年来, 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发展趋势都是上升的, 其中汉族出生人口性别比80年代初期就开始处于偏高状态, 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持续攀升。而少数民族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在1989年以前一直是很正常, 1989年以后超出正常值上限, 进入偏高状态, 并在1999年达到114的最高值, 在2000年略有下降。不过少数民族出生性别比整体水平低于汉族, 但变化的趋势完全相同。

2. 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偏高随各民族生育水平及下降幅度的变化而不同

不同民族的生育观念、生育政策、生育模式各不相同, 生育水平的变化程度也有很大差别。以回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为例 (见图3), 总体上, 这几个民族的生育水平下降速度都很快, 维吾尔族生育水平从80年代初的总和生育率5左右下降到2000年的2.2左右, 下降了约61.4%, 其中, 1985年总和生育率的值由于受年龄堆积的影响而无法估计, 1984年和1986年生育水平的准确性也就受到了影响。蒙古族和回族的总和生育率在20年间也同样迅速下降, 蒙古族的总和生育率从3.5~ 4.0左右下降到1.4左右, 下降幅度达63.3%, 回族则从3.5左右下降到1.6左右, 下降幅度为52.9%。

在生育水平急剧变化的同时, 出生人口性别比也在波动之中。从图4可见, 维吾尔族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在20年间一直在100到106之间的正常范围内波动, 回族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在1991

年起就超过正常值上限 107，而蒙古族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从 1996 年起出现偏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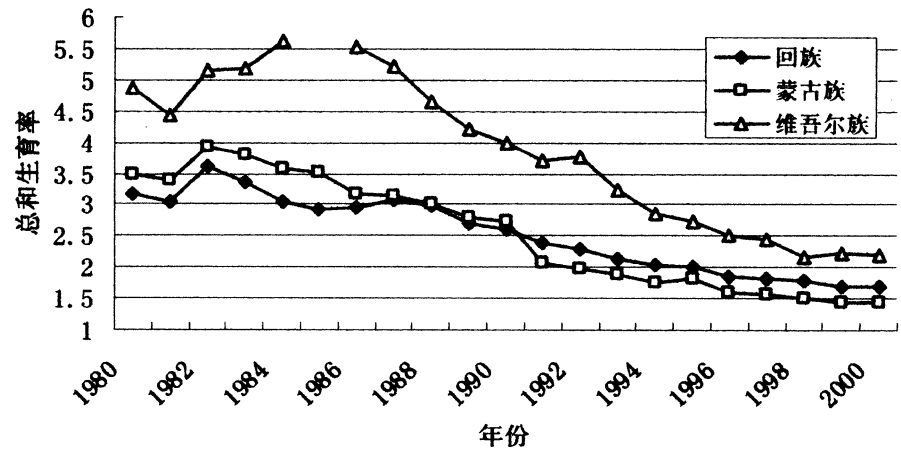


图 3 1980~ 2000 年回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生育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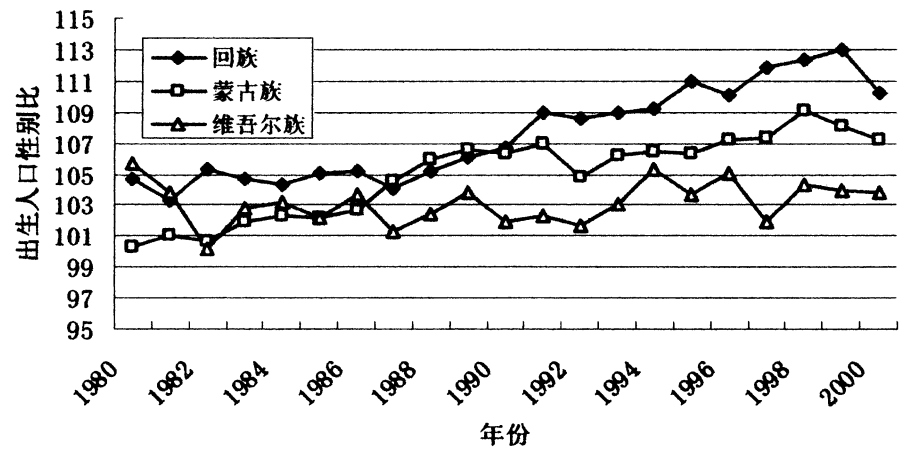


图 4 1980~ 2000 年回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出生人口性别比

从对图 3 和图 4 的研究发现，当生育水平维持在较高水平时，出生人口性别比始终保持在正常范围内，而当总和生育率下降到某一较低水平时，出生人口性别比则高于正常值。

有研究认为，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偏高与生育水平急剧下降有关，但从蒙古族与维吾尔族生育水平和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化过程的对比中发现，生育水平的急剧下降不一定都引起出生性别比的升高，而是要看下降到什么程度。蒙古族和维吾尔族的生育水平在 20 年间下降幅度都超过 60%，但维吾尔族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在正常范围内变化，而同一时期的总和生育率远远高于蒙古族，即使在 2000 年，其总和生育率最低也在 2.3 以上，高于蒙古族的 1.8。这说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偏高与生育水平的高低有很大关系。

3.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与生育水平的下降的相关程度分析

对全部少数民族出生人口性别比与总和生育率之间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二者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 0.965。从不同民族来看，汉族、蒙古族、回族出生人口性别比与总和生育率相关程度都很高，即出生人口性别比随着总和生育率的下降而上升（见表 1）。而维吾尔族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与生育水平相关程度则很低，与其他三个民族对比，维吾尔族生育水平的显著不同在于其生育水平较高，也就是说当生育水平较高时出生人口性别比与生育水平相关程度较低，即出生人口性别比不会随生育水平的变化而变化，而生育水平的变化至更替水平以下时，与出生人口性别比之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

表 1 不同民族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与总和生育率相关程度

民族	相关程度
汉族	- 0.953* *
蒙古族	- 0.887* *
回族	- 0.931* *
维吾尔族	- 0.330

* * 0.01 水平 (双尾)。

不过仅以维吾尔族为例，得出生育水平较高情况下出生人口性别比一定正常的结论未免武断。维吾尔族没有较强的性别偏好，出生人口性别比能保持正常水平，是受本民族文化影响还是因为生育水平较高，根本就不需要进行性别选择，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但从表 2 可见，由于对“五普”公布的 2000 年少数民族人口总和生育率存在疑问，有研究利用 1989 年总和生育率推算 2000 年的总和生育率（见表 2），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的少数民族总和生育率均在 2.1 以上，也就是说生育水平都相对较高。

表 2 部分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民族的生育水平

民族	1990 年总和生育率	2000 年总和生育率（推算值）	2000 年出生人口性别比
白族	2.81	2.218	105.36
哈萨克族	4.74	3.195	104.95
维吾尔族	4.65	3.156	104.68
藏族	3.80	2.755	101.70
傣族	2.68	2.141	100.79

数据来源：2000 年总和生育率推算值来源于黄荣清等，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各民族人口的变动，民族出版社，2004.10。

所以，从与生育水平下降的关系来看，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生育水平下降的速度快，另一个是生育水平下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上。生育水平急剧下降，在这一过程中生育观念并未发生相应转变，尤其是某些民族存在较强的生育性别偏好，例如重男轻女，这种偏好没有条件也没有时间发生转变。根据 G·贝克尔（G.S. Becker）的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当子女的数量选择余地较小的情况下，会转向对孩子质量的追求。在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上，我们认为，所偏好的子女性别其实也是一种生育过程中所追求的质量的一种。当生育水平较低时，对所偏好的子女性别受数量限制而无法满足，一旦 B 超等性别鉴定技术得到使用，这种偏好则得以实现；但当现有子女的性别满足需要，则停止生育，如生男即止。而无论哪种方式都会带来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升高。所以生育水平短期内急剧下降导致生育观念并没有条件随之改变，当生育水平下降到某一较低水平时，数量得不到满足则以所追求的子女性别作为质量来满足需要。

四、讨论与建议

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升高是在生育水平下降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受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由科学技术手段提供便利条件得以实现。在少数民族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趋势与汉族类似但还没有达到汉族的水平时要防止其继续升高。

生育水平急剧下降所伴随着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现象需要引起两点注意：

一是防止现有已经处于偏高状态的少数民族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继续升高。2000 年普查的百万人口以上的 18 个少数民族中，有 13 个民族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于正常水平，虽然程度各有不同，但生育水平都在 3 以下，与 1990 年相比都处于下降阶段。所以如果生育水平继续降低，在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出生人口性别比继续升高的可能还是存在的。尤其少数民族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与生育水平都与汉族 1990 年代初水平相近，防止少数民族在未来的 10 年出生人口性别失衡的急剧恶化局面的出现更是当务之急。

二是对于“五普”时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但生育水平处在下降过程中的（下转第 47 页）

毛病，那么就供给主体而言，就必须调整和更新就业观

1. 确立“普及化”就业观

目前我国不少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预期水平尚停留在静态期的水平，期望值过高，不符合实际。所以，大学生应改静态预期为适应性预期或理性预期，确立“普及化”就业观念，要有恰当的自我定位，适度调整自我期望价值和职业标准，自愿到小城镇和农村、到基层、到非正规部门去就业。

2. 树立“先就业，后择业”的观念

知识劳动力不必非要把第一个工作定为终身职业。实践证明，初次就业不一定适合自己，只有经过合理流动，才能使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

3. 确立“自主创业”就业观

我国自主创业的人员最早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出于生存的无奈，多半是被迫自己寻找饭碗的。其中不乏具有经营细胞和风险能力的人，后来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搏击而成功。在国有企业下岗的人员中，不少人通过自主创业解决了生存与发展问题。在面临“知识失业”时，知识劳动力应该尝试自主创业的路子。

参考文献:

- [1] 杨勇, 李先娥. 试论我国经济发展中“知识失业问题”[J]. 北方经贸, 2005, (2): 14
- [2] 荆德刚. 就业观察: 2006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式与对策[N]. 中国青年报, 2006-2-2
- [3] 李郁. 知识失业性质探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5, (7): 19.
- [4] 王效仿. 知识失业: 一个时代的来临[J]. 书摘, 2004, (9): 4-6
- [5] 杨冬民. 人才资源中“知识失业”现象的探析[J]. 经济问题, 2004, (4): 24.

[责任编辑 崔凤垣]

(上接第70页)

民族也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某些重男轻女思想较严重的民族更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由于少数民族的特殊性，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难度要更高。因此要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对其性别偏好进行正确引导，以提高经济水平为基础，以技术上控制为手段，以创造全社会尊重女性的氛围、提高人口的文化素质为目标，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进行综合治理，使新生人口的出生性别比逐渐趋于正常，以合理的人口性别结构来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奠定基础。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生育水平的估计未考虑数据漏报和不同民族通婚、少数民族人口国际迁移以及民族成分变更的影响，而且“五普”中单岁组死亡数据是间接估计得到的，而这些因素都会影响生育水平和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的准确性，所以只能是对其发展的基本趋势进行分析。

参考文献:

- [1] 顾宝昌, 罗伊. 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省和韩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调的比较分析. 人口研究, 1996, (9).
- [2] 原新, 石海龙. 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与计划生育政策. 人口研究, 2005, (5).
- [3] 张丽萍.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出生性别比问题研究. 西北人口, 2006, (1).
- [3] 王广州. 年龄别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间接估计方法与应用研究. 中国人口科学, 2002, (3).

[责任编辑 童玉芬]